

乡村传播文库



XIANGCUNCHUANBOYUNONGCUNFAZHAN

乡村传播

与 农村发展

李红艳 ● 主编

乡村传播文库

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

李红艳 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李红艳主编.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3

(乡村传播文库)

ISBN 978-7-81117-161-7

I. 乡… II. 李… III. ①文化学:传播学-调查报告-中国
②农村经济-经济发展-调查报告-中国 IV. G206 F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6489 号

书 名 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

作 者 李红艳 主编

责任编辑 张苏明

责任校对 陈莹 王晓凤

封面设计 郑川

出版发行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094

电 话 发行部 010-62731190,2620 读者服务部 010-62732336

编辑部 010-62732617,2618 出版部 010-62733440

网 址 <http://www.cau.edu.cn/caup> e-mail cbsszs@cau.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32开本 9.375印张 232千字

印 数 1~3 000

定 价 17.00元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前言：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的开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传播的观念与发展的观念便以大众媒介为动力点被结合起来。究竟大众传媒是否能够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或者说对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环境而言,大众媒介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研究者的角度和视野从发展中国的实证研究,延伸到对于传播权力、传播平衡和传播民主等问题的关注上。相对于发展状态和非发展状态而言,不仅仅是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如何借助媒介的力量缩短距离,还在于如何使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借助媒介的力量逐步发展起来,当然,这里的媒介已经不仅仅是指大众媒介,还包括人际传播媒介、群体传播媒介、组织传播媒介等。因而,对于乡村如何发展的问题的关注就在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而乡村传播(rural communication),即如何将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思想及其价值观念普及到乡村社会之中,无可置疑地成为政府与社会相关组织在特定时期的关注点。这种研究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以及 50~70 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均成为热点。由于这种研究主要是以美国学者为主,随着美国社会形态的转变,乡村社会与城市之间差异的缩小,其现实性的研究意义逐步在减退,研究本身也终从热点归于平淡。

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而言,这种研究却刚刚开始,也应该在整体的社会科学发展中成为焦点和热点。从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来看,关注乡村社会的学术和社会话题就没有间断过,有政府层面的,如国民政府时期的县政改革;有学术层面的,如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有实践层面的,如民国时期的大西北开发运动等。而在进入和平时期,尤其是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66 年之间,如何发展农村一度成为政府工作的重心,农村发展甚而成为

2 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

国家社会的总体发展目标:如何改造农民、如何教育农民、如何教育其他的社会阶层向农民学习、如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如何拓展农业技术等等,尽管当时的建设并没有忽视农业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重点还是集中在如何改造农民、由此改造社会的总体价值观念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也首先是从解放农民开始的,但是农民的解放只是一个短时期的政策行为,在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三农”问题便逐渐凸显,旧的问题还遗留着,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加之随着社会新的阶层的形成和流动,农民阶层也发生了变化。直至政府于2006年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次放在社会发展的重心之上,在这种状况下,社会各界力量也连带着被动员起来,共同思考和实践新农村的理想和现实前景。

因而,乡村传播的理念在历史的特定机缘处便重新在中国社会中,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赢得了焦点的位置。在这种情形下,本书从三个方面对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性的探讨,并将新农村建设的含义赋予其中。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历史发展篇,从历史的脉络中梳理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的事件、研究观点以及新农村建设提出之后的研究成果综述;信息建设篇,从媒体报道涉农信息出发,追溯不同时期信息报道内容和报道倾向的变化,并就主要的研究进行综述,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进行展望;传播机制篇,从乡村传播的微观形态机制与宏观形态机制描述出发,结合农村发展的相关传播效果加以综述,将新农村建设的宏观背景糅合在一起。全书将这三个部分综合起来,力图将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研究的全貌呈现出来。

因为能力和时间的关系,资料的综述和评述难免有不足之处,请各位专家指正。

李红艳

2006年12月1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历史发展篇	(1)
一、中国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	(3)
二、中国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研究的观点综述	(38)
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	(82)
第二部分 信息建设篇.....	(115)
一、中国乡村传播信息在农村发展背景下的种类及变迁	(117)
二、中国乡村传播信息与农村发展研究的观点综述	(140)
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乡村传播信息内容与农村 发展	(169)
第三部分 动力机制篇.....	(191)
一、中国乡村传播机制与农村发展关系的研究	(193)
二、中国乡村传播动力模式与农村发展研究的观点综述	(241)
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乡村传播机制与农村发展	(251)
附录.....	(269)
后记.....	(285)
参考文献.....	(286)

第一部分

历史发展篇

一、中国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

二、中国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研究的观点综述

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

一、中国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 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

研究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如果仅仅从当代历史出发作相关的资料收集,对于认识当下的中国农村发展的状况和对策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割断了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在我们自己所圈定的思维模式和现实意识中、在无尽的循环中,寻找我们所要理解的“真相”。那么,究竟在已经远去的年代里所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和曾经参与相关事件的人本身,对我们正在生存的现代和日常生活而言,留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痕迹将会呈现给我们一种重归历史的感觉呢,还是我们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现实的“真相”呢?

在这里,我们将历史界定在 1911 年至今。之所以这样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其一,关于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只是在近代以来才具有现实意义,在此之前,也并非不存在这样的关系形态,只是更多的是基于对于乡村的治理方面,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国家社会,对于农村发展的现代性意识还远未建立。其二,与传播观念和传播学学科的创立相关。传播学的确立是 20 世纪 20~30 年代,乡村传播便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的。因而,从近代出发来寻找历史痕迹,尽管并不是十分妥帖,就上述的两个原因而言,也勉强可以说得过去。

二者关系研究之历史脉络的寻找,将会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历史本身在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关系现状,另一个是对于这一时期的关系现状的研究状况。换言之,一种是历史事件的叙事模式,一种是历史事件中的人的叙事模式。

无论是哪一种模式,首先需要对于乡村传播的概念加以界定。什么是乡村传播呢?乡村社会内部以及与之相联结的外界传播系

统的传播现象,我们称之为乡村传播。它包括乡村社会的传播类型、传播模式、传播效果、传播者、受传者以及与乡村社会发生信息交流的传播活动。

从我们对于乡村传播这一观念的定义来看,乡村传播首先是对于乡村社会以及与之发展关联的所有传播状态的描述;其次,这种描述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是与人类自身的行为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鉴于此,乡村传播就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再次,日常性和广泛性是乡村传播的特性之一;再其次,对于乡村传播研究的动机和目的从一开始便是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整个乡村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①

(一)中国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的“事件”的叙述

历史“事件”的叙述,主要是从历史事件本身对于农村的影响谈起,这种影响客观上造成了外来力量对于乡村社会的作用力,从而也构建了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积淀。

这里的历史事件的时间段指的是从中华民国建立至 1978 年之前。在 1949 年之前,关注农村或者是以农村为实践主体和政策发布主体的历史事件,从政府和民间的角度大致包括:民国期间的大西北开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新生活运动、乡村教育运动以及关于农村土地的相关政策的颁布、实施等。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政府在关注农业发展和农村问题时的政策性名词会给我们很多启示:建国初期是“土地改革”,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是“农业合作化”,60 年代是“以粮为纲”,70 年代是“农业学大寨”,80 年代初是“多种经营和土地利用”,80 和 90 年代之交是“乡镇企业”,90 年代末是“农村问题”,千年之交是“农民问题”,2003 年是

^①关于乡村传播的概念,参见谢咏才、李红艳主编的《中国乡村传播学》第一章“中国乡村传播学的提出”,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年 9 月出版。

“‘三农’问题”，2005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些政策性的口号，实质是当时环境下农村应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国家需要的总体浓缩。

我们在这一部分，只是从乡村传播的历史事件的角度对此类事件做简要的描述，这种描述尽量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呈现，在下一部分，则围绕这些事件，从乡村传播的角度，将近年来的有关农村发展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传播学的层次加以概括。

1. 民国大西北开发运动：一场自上而下的乡村传播运动

1928—1930年，陕甘宁一带连续三年特大干旱，泾、渭诸河水涸，可以行车，粮食无收，哀鸿遍野。政府机关和民间慈善团体拨款、募捐，进行救济。但面对这样严重的旱灾，不能只做临时性的救济，应有进一步措施，因此国民党政府提出开发大西北。

当时说的开发大西北，实际主要是开发大西北的农业。农业开发要依靠农业科学，可是那时西北地区竟无一所高等农业学校，故开发大西北必须从兴办农业教育入手，为此决定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于武功。威胁西北农业最主要的是旱灾，兴修农田水利当然更刻不容缓。陕西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时提出“十年万井”计划，即在西北广凿水井，用以灌田。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陕西蒲城人）则在陕西省当局支持下，全力以赴地兴建大型水渠以解决引水灌溉的问题。

兴办农业教育是开发农业的基础工作，1932年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至1934年部分校舍建成，开始招生。首先招收的是水利系本科、预科各一班，后又招收农科、林科各一班。到1936年全部校舍建成，设水利、农艺、林业、园艺、畜牧兽医、农经6组，全面招生。

抗战前夕，西部地区实施高等农业教育的除成都的四川大学农学院和上述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外，还有兰州学院1932年增设的农业专修科和重庆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农业系，规模都很小。

1937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1939年边区政府在延安南三十里铺开办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设农艺、园艺、畜牧三部,校内附设边区农业试验场。这些设施标志着边区政府注意到用近代科学来开发边区农业。1941年,该试验场并入前一年在延安杜甫川建立的光华农场。光华农场是以饲养奶牛、种植蔬菜果树为主的保健产品农场,边区农业试验场并入后,光华农场改称“光华实验农场”,其任务在于集中技术力量,从事作物及家畜的品种改良和耕作饲养技术的改进等实验。

2. 农民运动讲习所:乡村传播的机构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林伯渠创办。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农民运动的实施方案,根据林伯渠建议,决定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委派彭湃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7月3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农民运动讲习所每届时间初定为1个月,毕业后选派为农民运动特派员。讲习所一共办了6届,在兴办过程中,讲习内容不断丰富,讲习时间也逐渐延长。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任务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才,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尤其是养成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规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的报考条件是:“中国国民党志愿从事农民运动者皆得报考。”因此,“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之取材,在第一二届,则以中国国民党员,志愿从事农民运动,而身体强健能吃苦耐劳者为合格;第三四届,则专招农民协会会员或佃农子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共办了6届,培养出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①

^①黄修荣. 国民革命史.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毛泽东 1924 年在湘江学校开办“农村师范部”，1925 年回韶山开办 18 所农民夜校，1926 年在广州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对农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

3. 新生活运动：一种间接的乡村传播模式

1934 年蒋介石在对工农红军连续发动军事“围剿”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文化“围剿”的同时，在江西省城南昌发起了所谓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运动。因其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入手，所以命名为新生活运动。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行动，用生活细节的要求来转移人民对政治、社会问题的不满，以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是：①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礼为四维之首，就是规规矩矩，不犯上作乱。②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做起。规定要拔上鞋跟，扣齐纽扣；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和洽邻里，同谋公益等。③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④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为目标，随时准备捐躯牺牲，尽忠报国。1934 年 2 月 19 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7 月 1 日，又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总会长。1934 年 7 月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为全面推行时期。其间，新运总会由南昌迁到南京，聘请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 33 人为指导员，又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宋美龄为指导长。在全国各省（直辖市）、各县设立分会或支会。这一运动受到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反对和抵制，未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实际收效甚微，抗日战争爆发后逐渐停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生活运动成为国民政府的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它曾被寄予“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的厚望，却在国民政府自身败退之前已然偃旗息鼓。相较于那几年共产党在农村所进行的更关乎民众疾苦的土地改革，它更

像一场只有编剧和观众却没有演员的闹剧。新生活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直面不久前那场涤荡了整个社会的新文化运动,承接那场运动所留下的一切——被破坏的和被期待的,完成的和未完成的,甚至,大喜之后难以自处的困顿。^①

4. 乡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传播运动

这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它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一般说是由于有的教育工作者认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是抄袭外国的,不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更不适应中国农村社会的需要,农村教育特别落后,亟待改革。尤其是中国近代农村饱受天灾人祸,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破产的边缘之后,有的教育工作者就提倡“到乡村去”、“到民间去”,不但极力鼓吹,造成舆论,而且实地从事,付诸行动。此后,关于“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呼声就成为旧中国一种社会思潮。当时,全国各地倡导这种社会运动的人们,所站的立场、所持的观点并不相同,目标也各异,所办的乡村事业也各有特点。有的以教育为中心,有的以生产为中心;有的以政治组织为中心,有的以自卫组织为中心;有的着眼于改造乡村生活,有的把政治、经济与教育事业综合进行。但追溯此项乡村事业的来由,一般均由教育开其端,嗣后因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需要的不同,逐渐扩大范围,最后把各种乡村事业(政治、经济、教育等)加以综合,仍以教育为枢纽,因而乡村建设运动,也就成为广义的乡村教育运动。

乡村教育运动主要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延伸和发展。因为当时中国人口80%以上在乡村,乡村中文盲的比例占乡村人口的90%左右,这就决定了真正彻底的平民教育运动必然的主要是乡村教

^①戚肖肖. 1934—1937年的文化重构. www.publishblog.blogchina.com/blog/tb.b?diaryID=1285316.

育运动。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时,即订立了将平民教育由城市逐渐向乡村推进的计划,他们计划投入平民教育工作的比重越来越向乡村倾斜,乡村第一年占10%,第二年占18%,第三年占50%,第四年达70%,第五年全部转入乡村,占100%。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自1923年10月由晏阳初任总干事后,主要在城市从事平民识字运动,后来由分析文盲数量而注意农民,因研究农民教育而移往乡村。1926年该会选河北省定县为华北试验区,从翟城村入手,进行平民教育、农业改良、社会调查等工作。至1929年该会才集中全力以县为单位在定县进行实验。他们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来进行生计、文艺、卫生与公民“四大教育”,企图解决他们所谓中国农村的“四大病”,即贫、愚、弱、私,并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建设”。

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26年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设立乡村改进区,推行社会教育,改进小学教育。他们的目的是:提高文化,培养新农民,使农民有自治能力,同时改进农业。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于1926年主张以乡村学校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强调要教育农民有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本领,能自立、自治、自卫等,并筹办晓庄学校,于翌年春开学,成为乡村教育运动的重要阵地。他企图用教育来改造乡村生活,带有空想的成分,但他反对封建传统教育和盲目“仪型他国”教育,这是有进步意义的。晓庄学校被国民党政府封闭后,陶行知又创办山海工学团,注重培养农民在军事、生产、科学等方面的能力。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1年成立,除指导研究生和训练乡村服务人员外,还在邹平、菏泽两个实验县办乡农学校、乡学村学。这种学校是把中国宋朝、清朝曾推行的“乡约”制度加以修改补充,以学校为外貌,由“乡村领袖”(地主绅士)“学众”(农民)和“有志于乡村运动”的知识分子(教员)组成。这实

际上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是政治、经济、教育、自卫的综合体,既对农民进行宗法思想教育和地主武装训练,又行使一乡(村)的行政权力。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附设有农场,供本院学生进行农业实习,又是实验县农业推广的场所。

20世纪30年代,以高阳为代表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设有研究实验部,在无锡设了惠北实验区、北夏实验区等,进行乡村成年民众教育、电化教育、农事教育,改良蚕桑,实行养鱼、植树、开荒,扩大农业生产。

除了江苏无锡、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处和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在巴县开展的乡村教育运动外,还有上海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的工学实验,浙江湘湖省立乡村师范学校的农工试验班,大夏大学民众教育实验区金家巷农村念二社民生本位的教育实验,燕京大学设立的农村建设科及清河试验区,以及南开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与“平民教育促进会”曾合组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等,都曾进行过研究实验及训练工作。“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于抗日战争时期移至贵州定番,改称“农村建设协进会”,下设乡政学院,训练各校四年级学生和研究生。重庆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是在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院于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巴县等地进行乡村建设的研究实验工作。晏阳初也于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附近的歇马场创办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改为乡村建设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和大文学学院乡村教育系于抗战后改为乡村建设系,在该系任课的教师主要来自定县、邹平和无锡;该系曾编辑出版《华西乡建》刊物及《乡农报》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乡村建设或乡村教育逐渐衰落,不再成为一种社会运动。

5. 土地改革:由外及内的乡村社会的整体传播

1949年10月以前,全国大约有1.19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主要是抗战开始以后中共所管辖的地区。1949年冬天,在中共新解放的一些地区,主要是华北的一些城市的近郊和若

干农村地区,加上河南的一半地区,总共有 0.26 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将来在南方新解放区,必须“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两年后“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1949 年 9 月的“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将“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南方新区土地改革的启动是在 1950 年 6 月。当月 14 日,刘少奇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提出 1950 年冬天完成大约 1 亿农业人口地区的土改,1951—1952 年是 1.64 亿农业人口的大部分地区,余下 0.2 亿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暂不进行土改。

6. 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外部推动为特征的乡村内部的传播活动

农业合作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大体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49 年 10 月至 1953 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1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此后,各地党委加强了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到 1952 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 830 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 40%,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3 600 余个。

1952 年冬至 1953 年春,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种倾向,中共中央于 1953 年 3 月 8 日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又于 3 月 26 日发表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并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4 月 3 日,中共中央农村工